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

——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赵雅妮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关键词】童本《教程》;文学话语;含蓄蕴藉

【中图分类号】I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3-0056-04

在近几年国内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活动中,文论教材的编写与学科建设无疑成为一股热潮。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市场上出现的文论教材竟达一百多种。然而,在众多的教材中,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被大家公认为是一本“换代”教材,在众多教材中脱颖而出。教材本身宏大的体系、学术的包容性与视野的开放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及其中西理论的交互性生成与阐释等,都是同类教材不可比肩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些独具个性的探索与理论创新,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版本不断改进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以下就“文学话语活动”理论为例做具体剖析,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能够有助于本教材的进一步完善。

一 理论生成与叙述逻辑

文学作为话语活动,是教材的一个亮点,它贯穿在教材的整个体系之中。涉及到文学话语活动的论述主要分布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而对文学作为话语活动的具体论述,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第三节。统观这些章节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教程》关于“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的。

1 文学作为话语

通常人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即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这一点是所有教材所公认的。但是,《教程》在对文学本质的论述中提出了:文学是一种话语,“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文学却是以话语的方式存在的”^{[1](p68)}。

于是,《教程》在对文学作为活动作了专章论述之后,就转向了文学与话语关系的论述,确定了文

学是一种话语活动的思想。首先,教材就“语言”、“言语”、“文本”和“话语”这一组概念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语言系统”和“言语”分别指社会普遍规律性语法系统和个人的语言行为;“文本”是供阅读的特定语言构成物;而“话语”则比两者的总和更丰富、更复杂,它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本文而展开的沟通活动”。^{[2](p69)}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包含以下5个要素:一是说话人,即体现在文本中的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和作家因素,这是话语活动的主体之一;二是听话人,即阅读本文的接受者角色或读者因素,这是话语活动的另一主体;三是文本,即供阅读以便达到沟通的特定语言构成物,这是话语活动的中介;四是沟通,即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通过本文阅读而达到的相互理解或融洽状态,这是话语活动的目的;五是语境,指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语言关联域及其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这是话语交流活动得以进行的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成为一种对话,一种作家与读者交谈、沟通、问答的对话,文学的这种主体间对话的性质是文学活动存在的特定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活动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而是一种独特的话语表意实践活动。

2 文学话语的特征

既然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表意实践活动,它就有别于其他话语活动。这具体表现为:文学话语既不同于语法意义上的语言,又和一般的科学话语和日常话语相异,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科学话语作为科学领域使用的语言,强调严谨的逻辑和语法结构,要求概念明晰、说理清楚,而不注重个人

收稿日期:2008-06-09

*基金项目:张利群教授主持的“广西教育厅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改革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

作者简介:赵雅妮(1980—),女,陕西凤翔人,安康学院中文系教师,广西师范大学美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风格和感情色彩。日常话语服务于具体语境的交往活动,虽然较富感情色彩、个人风格,但总体上以实用、表情达意为目的,注重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这两种话语都强调语言的外指性,即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世界,寻求所指与能指的直接统一,使其能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文学话语则不同,它明显突破了语言学用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要求,强调个人的感情色彩和风格。它一般不是作为说理的手段和对具体事物的指称,而是作为描写、表现、象征的符号体系,常常通过对语言的变形和一定程度的扭曲,并采用隐喻、暗喻、转喻、暗示、象征等形式来表达作者的人生体悟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强调对语言的独创性运用和语言自身的新鲜感,以便加强读者对事物的感受力度和理解的深度,最终延长审美感受的长度。这具体表现为文学话语的三大特征:首先,文学话语具有拒阻性,使文学话语所指涉的意义往往不能一眼看穿。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诗通过几个意象的并置,烘托出一种凄凉萧瑟的气氛,给人以羁旅孤寂的悲伤和宇宙人生的苍桑感。诗的话语否定了语言的指称功能,而指向个体内在的审美体验,给人以灵魂的慰藉和审美的享受。其次,文学话语具有内指性,它指向文学文本中的艺术世界,而不必符合现实生活和日常话语的逻辑。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月是故乡明”等明显违反客观事实,但却符合艺术世界诗意的逻辑。最后,文学话语又具有情感蕴含性,每一个意象都蕴含了作家丰富的感知、想象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具有不同的心理内涵。枯藤、明月等都是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具有丰富的心理内涵。文学话语常常使用象征、含蓄、含混等修辞手法,使文学作品看似单义而确定的话语蕴蓄着多重而不确定的意味,令读者回味无穷。这使文学话语摆脱了普通话语的具体的、凝固的“所指”,而成为飘浮游动的“能指”,具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总之,文学话语可以是陌生的、扭曲的,它可以不合语法常规,但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从而获得较强的审美效果。

文学正是以一定的话语形态蕴含多重复杂意义或是将多重复杂意义蕴含在一定的话语形态中,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通过这种话语蕴藉而参与到文学活动之中,不同的只是作者创造话语蕴藉,而读者则再次参与了话语活动的体悟与重建。

二 独具个性的理论特色

1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突出了文学的活动特性

文学作为话语活动,这一论述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的第三节。它与《教程》在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活动论出发把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即人的一种生活活动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完整表述。教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文艺活动论’为中心,建立了崭新的文学理论体系。”^{[3](p115)}在此基础上,“《教程》对文学本质的揭示,克服了以往只作静态的、单一的考察,从而忽视从文学所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动态考察的局限。首先把文学理解为完整动态的文学活动系统。”^{[4](p72)}《教程》又将文学活动论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结合。将文学话语活动系统地看成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构成的一个交往循环结构。围绕着作品这个中心,作者、世界、读者之间建立起的是一种话语交流的互动关系。这与后面的论述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这样,把文学看作话语活动就比过去把文学当作静态的语言艺术更加突出了文学的活动特性,使文学回归到它的历史起点之上。

2 中西融会贯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体现了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理论创新的胆识

正如该书在修订版后记中所说:“它摆脱了50年代前苏联旧教材的范式,同时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经过文学实践检验的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鉴别和筛选,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加以融合,纳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来;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凡正确的、深刻的,都酌情加以吸纳;对当代现实文学活动中提出的问题也尽可能给予了具有科学理性的回答,使整个教材面貌在稳妥中又有了较大的改变”^{[5](p383)}。从编者的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直接领略到编写者的胆识与魄力及其编写者开阔性的学术视野和包揽一切的“野心”。“从初创性教材到带有总结意味的教材,童庆炳10年来留下丰硕成果,更留下深深脚印:如果没有甘冒政治与学术双重风险的胆识、没有虚怀若谷地学习和吸收新东西的气度,以及没有逆境中默默耕耘的韧劲和甘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是决不可能如此跋涉过来的。而这些如用一个词去统摄,不正是一种可贵的探险精神么?”^{[6](p12-13)}这一编写原则和胆识确实体现在了整个教材中,从整个体系的设置到各章节的编排,从每个章节具体问题的论述到每一实例的选讲。如教材在论述文学话语理论这一节时,从大的方面来讲,它积极借鉴了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对一些关键性范畴的运用,如语

言与言语、话语、含混、陌生化等,同时又融合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从小的方面来说,他在对某一具体范畴的解说中,注重文学实例的多元化。可以说是古今中外都涉及了,而这是以往教材编写者很难驾驭的。

例如,编者将“蕴藉”这一中国古典诗学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蕴藉”一词最初来自中国古典诗学,“蕴”原意是积聚、收藏,引申为含义深奥;“藉”原意是草垫,有依托之意,引申而为含蓄。“蕴藉”一词先是用于品评人物,多指人物性格的宽容和有涵养。后来进入文学领域,并被广泛使用,其内涵重在强调文学的语言与意义蕴蓄深厚,余味深长。教材在对该术语原意和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和阐释之后,对其赋予了较为宽泛而更具包容性的含义,即“指一种内部包含或蕴含多重复杂意义,从而产生多种不同理解可能性的话语状况”^{[7](p69)}。这样,“蕴藉”就由具体的文学文本层面上升到整个文学活动层面。而且编者在其文化语境与理论背景相异的情况下,把言语、话语、含混、陌生化等西方文论范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相融合。如含蓄,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主要是指文学语言“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馀意”,给读者一种咀嚼不尽的美感享受,而“含混”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最初是英美新批评家燕卜苏在其文章《七种类型的含混》中提出,主要指文学语言的歧义、复意、多意性,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诗语言具有无限丰富性的立场,同时也强调意义的含混须为诗歌的张力服务”。^{[8](p241)}诸如此类,编者将其统一于关于文学话语蕴涵无限意义生成可能性的论述之中。这体现了编者努力寻求中西文论的内在结合点,尽量将更多的优秀理论成果摄入教材,从多角度多层次审视文学话语的本质与特性的理论热情和胆识。

3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突出了文学审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在注重文学社会属性的同时也注重话语活动的审美属性,凸现文学语言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密切联系。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最为有用的是把‘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出于不同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些种类的写作,这些写作则处在一个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内;如果有什么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这一完整的实践领域,而不仅是那些有时被颇为晦涩地贴上‘文学’标签的东西,把文学视为话语或话语实践主要是因为这种语言形式本身正处在完整的

社会生活过程的相互作用中”^{[9](p69)}。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在无功利、形象、情感中隐含功利、理性和认识。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具有审美与社会双重属性。在审美表意话语实践活动过程中,审美表意话语实践与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相互浸染、彼此渗透。话语理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延伸了文学的审美与社会双重属性,强调了文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

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文艺界在研究文艺本质问题时,往往很难摆脱“政治”决定论的影响,就当时国内的社会思想观念与研究资料来看,文艺的政治历史维度始终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占文坛,文艺的阶级性、人民性较为浓重的凸显出来,政治思想工作与文艺会议紧密一致,文艺被看作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并在因果关联上将文艺史看作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经典文本成为衡量文艺观与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而这一切就构成了当时国内文艺界、学术界认识文艺本质问题的“语境”,也是文论教材撰写的历史背景,整个文论教材的编写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八十年代起,改革开放,思想重新被激活,国外的各类文艺思潮、论著被借译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内的文艺创作,艺术的审美维度被文艺界、学术界逐渐接受、认可,对文艺类型、文艺作品自身规律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大家开始普遍认识到,文艺研究应落实为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文艺作品的研究应落实为文艺作品存在方式的研究。于是,编著一本“面向21世纪的”文论教材成为学界的期盼,并掀起了一场教材编写的热潮。而在这次文论教材编写的热潮中,对于文艺审美维度、文艺自身规律的思考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成为教材编写试点的“瓶颈”。在这一批教材中,童本《教程》脱颖而出,被各界公认是本最“权威”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在文学本质问题上,对文艺审美维度与历史维度之间关系的处理。并且在各章节的处理上,较好地做到了文艺活动的自律与他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审美维度与历史维度的辩证统一。它坚持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认同文艺自身审美特性的价值;坚持文艺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认同文艺自身规律的独特性;坚持文艺社会历史维度,认同文艺审美维度。实现了艺术本质问题审美的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三 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http://www.cnki.net>

然而,我们在对《教程》中文学话语理论的剖析中,除了看到编写者理论创新和独特个性之外,也要看到作为一部合编的探索性教材,尚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1 一些概念使用混乱

虽然教材在立论之初就已经对语言、言语、文本、话语一组概念作了界定与区分,但就全书来看,在不同章节的具体叙述中,编写者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是含混的,特别是对“语言”、“言语”、“话语”的使用往往依据具体知识点和理论表述的需要而任意互换,给人以混乱感。其次,编写者在积极借鉴了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在具体理论观点的借鉴和融合方面,对一些颇有影响但存在极大相对性和片面性,已受到人们怀疑乃至提出异议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不加分析和鉴别地引用。”^[10](p81)]对一些关键性概念的运用,如语言与言语、话语、含混、陌生化等,没有考虑其文化语境与理论背景的差异,把它们和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进行了强迫性融合。

在中西结合古今互释的原则指导下,教材在融合中外相关理论时表现出某些牵强,如教材在论述文学话语的典范形态之一——含混时用括号注出其在西方文论中指本义的歧义、复义、多义,既而给出教材赋予的新义,并选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论和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例释。整个阐释是一种古今中外大拼凑,理论事例简单叠加,没有真正讲透含

混的内涵和外延。所以,《教程》总揽中外文学家和理论家探索文学话语多意性的种种成果,在没有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差异的基础上,把它们统一于文学话语具有意义无限生成可能性这一特性之内。

2 有些知识点在不同章节的重复并置

《教程》将同一论题以不同概念在不同章节重复论述,如第十章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关于文学话语、文学形象和文学意蕴,在十五章被分别阐述为文体期待、形象期待和意蕴期待。尽管教材自认为思路一致和连贯,但话语与文体毕竟大相径庭,第十章文学话语与普通话语的区别,在第十二章又以抒情话语与普通话语的区别重复阐述。

综观近二十年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我们认为童本《教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它努力建构一个新的文学话语理论体系。在新的学术环境下,大胆吸收中外有关文学话语理论的优秀成果,弘扬传统与借鉴西方文论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多维度审视文学话语活动,揭示文学话语活动的本质与特征。虽尚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其功劳与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有些不足与这是一本合编教材有一定关系,需在以后的修订中不断地调整、完善。至于融合中西古今文论成果来构建中国当代的文论体系,则是一条有待于我们文论工作者进一步探索的漫长而艰辛的征程。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5][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3]刘广新 胡友峰.对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理性反思[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 [4]赵小虎.《文学理论教程》简评[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2.
- [6]王一川.探险者风范——略说童庆炳的教材工作[J].当代批评家论·童庆炳专辑,2005,9.
- [8]朱立元 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9]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M].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87.转引于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69页.
- [10]郭昭第.《文学理论教程》缺憾剖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1.

Analyzing Literature Discourse Activity Theory

——And Discussing the Gain and Loss of Tong qing-bing's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ZHAO Ya-Ni

(Literature Institut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Literature Discourse Activity is doubtlessly a little bit bright of Tong's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 It not only traces back to history point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lso insists its logic point, namely literature discourse activity. The body of this part appears to be this textbook's character. But there also exist some shortages. The article hope to analyze the Literary Discourse Activity theory and contribute to further perfect the compile of the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

Key words: Tong Qingbing's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Literature Discourse;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